

二十世纪文库

公民文化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 西德尼·维伯 著
徐湘林等译



华夏出版社

公民文化

——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
西德尼·维伯 著
徐湘林 译
华夏出版社

1989年·北京

责任编辑：崔学谔

封面总体设计：郭力 钮初 呼波

李明 王大有

本书封面设计：王洪流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by

Gabriel A. Almond

Sidney Verb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U.S.A., 1972.

公 民 文 化

——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 著
西德尼·维伯

徐湘林 戴龙基 唐亮 译

胡苏薇 周志忍 凌岩

沈叔平 沈师光 校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柳芳南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9.375印张 461千字 插页2

1989年4月北京第1版 198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400 册

ISBN 7-80053-307-7/D·040

定价：7.50元

译者序

这是一部政治文化比较研究的权威性著作。作者加布里埃尔·亚伯拉罕·阿尔蒙德现在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的名誉教授。他生于1911年，曾就读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1938年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执教多年。阿尔蒙德还担任过美国政治学学会会长、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学会比较政治学委员会主席等职，是战后美国的著名政治学家、政治学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创始人。本书的另一位作者西德尼·维伯现在是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生于1932年，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1959年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担任过哈佛大学政府系系主任、艺术和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政治文化是本世纪50年代才开始使用的政治学概念。1956年，阿尔蒙德在《政治学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了他关于政治系统的初步想法。在该文中，他根据人类学中关于文化研究、社会学中关于社会化和小团体研究以及心理学中关于个人性格研究的新成果，第一次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此后不久，政治文化的概念很快被人们所接受，并成为政治科学（尤其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公民文化》一书则是60年代众多的政治文化研究专著中最享有盛誉的一本。

《公民文化》是阿尔蒙德和维伯在对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5国居民的基本政治态度进行大规模的抽样调查和分

D42-36/61

析比较的基础上写作而成的。这是一项规模空前的研究工作。从计划研究到完成著作共花了5年的时间，其中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对5国中5千人作了单独采访。还有众多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调查方案的设计和资料的分析处理工作。据说整个调查研究费用高达200万美元。除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之外，作者还广泛吸收了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哲学、人类学、精神病理学等学科的新成果，运用历史的和行为科学的方法，对5个国家政治文化的模式和特征进行了综合性的分析和比较，并提出了政治文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一套跨国比较研究的方法。作者还十分注意资料的代表性和结论的准确性等问题，在对政治态度的量化分析以及比较研究中的等值和可比性问题等方面都作了十分有益的探索。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本书中使用了“德国”(Germany)一词，我们在所有统计表中，将其全部改为“西德”，而在其他译文中，根据其特指含义，或采用了“西德”，或采用了“德国”。

我们必须注意，在本书中，作者完全是以西方的民主政治原则和价值观作为判断政治生活的准则的，尤其是把美国和英国的政治文化乃至政治体制看作是理想的东西。作者所持的这一种明显的偏颇立场，是我们在阅读中应加以注意的。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徐湘林(序言、第一、二、十五章)，戴龙基(第三、四、五、六、七章)，唐亮(第十三、十四章)，胡苏薇(第八、九章，附录一、二)，周志忍(第十章)和凌岩(第十一、十二章)同志。由沈叔平和沈师光同志承担校对工作。最后由沈叔平同志通校全书。由于我们几个译者水平有限，加之目前对当代西方政治科学中的许多新理论的概念和术语的翻译尚处于探讨阶段，因此，译文中的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仁及读者不吝指教。

译 者

1987年8月于燕园

序 言

大约30年前在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处时，研究民主政治文化的这个愿望就已有了。现在，在行为研究方式名义下进行的政治学研究，多数是在两次大战之间从这里开始。本书就是对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们的赞颂，他们所制定的政治科学的概念在经过30或40年的酝酿后终于成为公共的财富。这一研究的灵感特别要归功于查尔斯·E·梅里亚姆(Charles E. Merriam)的著作。他的《公民的培养》(Civic Training)丛书概述了本书所涉及的许多问题，而他的《政治学的新方面》(New Aspects of Politics)所提出的方法已被运用于我们的研究之中。

我们在本书中论及了许多政治科学的古典课题，如古希腊人所说的公民品德和它对民主政体的效用和稳定的影响，公共社会生活，社会组织以及对儿童公民品德的培养。在研究这些古典课题所进行的调查研究中，我们也遵循传统的做法，即依靠可用于我们调查这些问题的最精确的种种方法。如果托克维尔(Tocqueville)和布赖斯(Bryce)现在还活着的话，也许会在他们的民主态度的比较研究中，采用这种剖面调查(cross-section survey)的办法。

我们的研究将表明，在英国和美国存在着维护稳定的民主程序的一种政治态度的模式和一整套隐含的社会态度。在被研究的其他3个国家——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中，却很少有这种情况。但是，这个结论不应该使读者对后3个国家的民主前景产

生失望。我们的研究只是对这急速变化的世界所拍的一张快照，虽然我们能够列举出这些国家要实现较稳定的和较民主的政体可能不得不克服的某些严重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够而且也没有得出结论说这些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结论也不应该使读者对前两个国家——英国和美国的民主感到满足。只要它们人口的重要部分还得不到对政治系统的充分参与和进入种种社会改进行列，它们的民主诺言就仍然是没有完成的。

大约5000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墨西哥人和美国人——接受了采访，为我们提供了资料。在这个由大学赞助的、对民主与政治参与问题的科学研究中，我们要求我们在这五个国家的城市、市镇和乡村的响应者与我们合作。从实际的意义上讲，这是他们的书，而我们作为本书的作者则希望取得他们的信任。

从计划这项研究到研究的完成花费了5年时间，我们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首先我们谨向已故的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弗雷德里克·S·邓恩(Frederick S. Dunne)表示感谢，在研究开始时他曾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我们还要感谢该研究中心主任克劳斯·诺尔在本项目的后一阶段给予的大力支持。在研究计划和调查方案的制定中，以及在项目安排上，我们都得到了纽约国际研究学会的帮助；我们尤其感谢埃尔莫·威尔逊(Elmer Wilson)、海伦·迪纳曼(Helen Dinerman)和费兰克·博尼拉(Franck Bonilla)的合作。全国心理卫生协会的莫里斯·罗森堡(Morris Rosenberg)在计划阶段中，在研究方案的设计以及预测分析中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赫伯特·海曼(Herbert Hyman)在研究的计划和预测阶段都给予我们巨大的帮助。莫里斯(Maurice)、鲁思·法伯(Ruth Farber)和罗伯特·E·莱恩(Robert E. Lane)对调查方案的设计作出了创造性的贡

献。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获得了若干人在研究上给予的帮助。在采访方案的计划和预测以及对其他调查中类似材料的收集等方面，路易斯·K·康福特（Louise K. Comfort）充当了主要的角色。安妮·蒙霍兰（Anne Munholland）提供了普通统计上的帮助，并且承担了出版前重新核对我们的资料的繁重任务。莫里斯·戴维斯（Morris Davis）为我们对其它材料的分析撰稿，并且准备了有关公民理论的摘要。安纳利莎·凯利（Annalisa Kelley）帮助收集了其它资料和翻译了研究文件。安妮特·杜西（Annette Ducey）和威廉·弗拉纳根（William Flanagan）监督并完成了大部分资料的统计学分析；洛塔·多夫门（Lotte Doverman）和彼得·阿尔蒙德（Peter Almond）参加了统计分析，还有多夫门夫人为第十四章示范案例史提供了草图。我们还感谢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Scott）在分析墨西哥生活史采访方面所给予的帮助。

在秘书工作方面，我们感谢盖尔·阿尔格伦（Gail Ahlgr-en）、巴巴拉·雅克布斯（Barbara Jacobs）和萨拉·邦迪（Sarah Bondy）。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也有一些工作人员参加了本书原稿的最后准备工作。

我们衷心地感谢在每一个被研究国家中的采访代理人与我们的合作。在美国，我们的调查由芝加哥大学全国舆论研究中心指导，该中心由塞尔玛·蒙斯基（Selma Monsky）和雅各布·弗尔德曼（Jacob Feldman）的领导；在英国，伦敦的调查服务有限公司在马克·艾布拉姆斯（Mark Abrams）和A·E·S·埃伦伯格（Ehrenberg）的领导下进行了调查；在德国，法兰克福DIVO研究所在格哈特·鲍默（Gerhart Baumert）和彼得·施米特（Peter Schmidt）指导下完成了采访计划；在意大利，这

项工作是由在欧内斯脱·诺伯多 (Ernesto Norbedo) 指导下的米兰意大利公众舆论研究所进行的。墨西哥的调查是在乔治·盖瑟 (George Gaither) 和艾尔弗雷德·威尔逊 (Alfred Wilson) 所领导的墨西哥城的墨西哥国际研究学会完成的。

哈利·埃克斯坦 (Harry Eckstein)、赫伯特·海曼、罗伯特·斯科特 (Robert Scott) 和亚历克斯·英克尔斯 (Alex Inkeles) 详细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且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这项研究受到了纽约卡内基公司的慷慨支持。我们有许多理由向该公司的理事们，尤其是向约翰·加德纳 (John Gardner)、威廉·马维尔 (William Marvel) 和詹姆斯·珀金斯 (James Perkins) 表达我们的谢意。不用说，我们对这项研究的内容和结论是负有责任的。

G·A·阿尔蒙德

S·维伯

1962年8月

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

- 主 编:** 邓朴方
- 常务编委:** 李盛平 张宏儒 肖金泉 贾 湛 王 伟
沈志华 黎 鸣 吴儂深 张显扬 陶德荣
褚朔维
-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 | | | | | |
|-----|-----|-----|-----|-----|
| 于 沛 | 马在新 | 王 焱 | 邓正来 | 孙立平 |
| 孙连城 | 刘再复 | 李泽厚 | 朱青生 | 朱庭光 |
| 邵大箴 | 何家栋 | 吴衡康 | 林 方 | 范 进 |
| 张 琢 | 周 星 | 顾 昕 | 倪文杰 | 俞敏生 |
| 郭建模 | 唐 枢 | 高 崧 | 程方平 | 缪晓非 |
- 政治学分编委会:**
- | | | | | |
|-----|-----|-----|-----|-----|
| 缪晓非 | 杨百揆 | 刘庸安 | 王燕滨 | 郭 夏 |
| 陈北钢 | 吴知论 | 张厉厉 | 刘在平 | |

目 录

序 言	(1)
-----	-------

第一部分 此项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第 一 章 一种政治文化的研究途径	(3)
第 二 章 跨国研究和政治行为：关于方法的几点考虑	(47)

第二部分 政治文化的模式

第 三 章 政治认知的模式	(89)
第 四 章 对政府和政治的情感	(113)
第 五 章 党派活动的模式	(136)
第 六 章 参与的职责	(183)
第 七 章 公民的能力意识	(205)
第 八 章 公民能力和臣民能力	(242)
第 九 章 能力、参与和政治的忠诚	(258)

第三部分 社会联系和政治文化

第 十 章 社会联系和公民合作	(287)
第十一章 组织成员和公民能力	(331)
第十二章 政治社会化与公民能力	(354)

第四部分 政治文化的几个侧面

第十三章	政治取向中的群体差别·····	(411)
第十四章	五种政治文化·····	(438)

第五部分 结 论

第十五章	公民文化和民主制的稳定性·····	(517)
附录一	抽样和样品误差·····	(554)
附录二	采访程序表·····	(576)
附录三	调查政治、生活历史·····	(592)

第 一 部 分

此项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第一章 一种政治文化的研究途径

这是一项对民主的政治文化以及维持这一文化的社会结构和过程的研究。人类理性和自由必胜，这一启蒙运动的信念在最近几十年中已两次动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引起了对西方民主必然性的严重怀疑，而我们仍然不能保证欧洲大陆国家会发现一种稳定的民主体制来适应它们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制度，我们也不能过多地希望它们会共同发现一种欧洲的民主制度。

这些怀疑还没有开始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各种事件却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提出了民主政治的前途问题。亚洲和非洲的“国家激增”，以及以前被控制被孤立的民族要求进入现代世界而产生的几乎是全球性的压力，把这个很突出的政治问题置于世界文化未来特征这个大问题之中。文化的变化在世界历史中已获得新的意义。三四百年前，西方对启蒙和控制自然（人们已从中获得力量）的探索已成为遍及世界的进程，而它的发展速度则已从几百年缩短到几十年。

这个正在出现中的世界文化将具有什么样的内容，已成为今后几十年中公共政策的中心问题。我们已经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并且能够根据我们对文化传播过程的知识对此问题作出预言^①。实体货物和它们的生产方式在传播中似乎显得困难最小。显

① 拉尔夫·林顿：《人的研究：导言》（Ralph Linton, *The Study of Man; An Introduction*），纽约1936年版第324—346页。——原注

而易见的是，西方文化的这些方面，以及它们所依赖的技术，都正在迅速地传播。既然经济的现代化和国家的统一，要求对运输、交通和教育进行巨额的社会投资，既然这些投资反过来又要求税收、规章和管理，那么合理的官僚机构的模式也就相对容易普及。一种有效的官僚机构概念与合理的技术概念有许多相同之处。卢西恩·派伊（Lucian Pye）指出，现代社会组织是建立在一种组织技术之上的。^①它与工程学和技术共同之处是：它是合理性与权威性的融合。工程学是将合理性和权威性运用于具体物件；现代社会组织则是将合理性和权威性应用于人和社会集团。当非西方世界尚远不能成功地发展一种工业技术和一种有效的官僚机构时，它无疑是需要这些制度并且要求对它们有些了解。

关于正在出现的世界文化的内容，疑难之处在于它的政治特征。当寻求技术和组织合理性的运动在整个世界尚处于极其同样状态时，政治变化的方向是不大清楚的。但是，这种新的世界政治文化的一个方面还是可以察觉的：这将是一种参与的政治文化（a political culture of participation）。假如有一场政治革命正在整个世界发生，那么它就可以称之为参与激增。在世界所有新兴国家中，普通人与政治是有关的（在政治系统中他应该是一个与己有关的参与者），这一信念广为流传。处于政治之外的广泛的人民团体正在要求进入政治系统，与此同时，我们也很少见到政治精英对此目标不表示赞同。

虽然这个正在到来的世界政治文化看来要被参与激增所支配，但是，参与的方式是不确定的。新兴国家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现代参与的国家模式，即民主的模式和极权的模式。民主国家为普通人提供机会，以具有影响的公民身份，去参加政治决策的过

① 比较政治委员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关于现代化概念的记录》，1961年11月。

原注

程；极权主义则为之提供“参与服从”的角色。^①两种方式对新兴国家都具有吸引力。然而，哪一种将取得成功——假如这两者确实没有出现某些融合的话——却难以预料。

如果民主参与的国家模式要想在这些新兴国家中发展，那么它所需要的就不仅仅是正式的民主制度——普选制、政党、选举立法。事实上，如果从形式的而不是功能的方面看，这些制度也是极权参与模式的组成部分。参与政治系统的民主体制还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但是，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文化向新兴国家的推广却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这里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涉及到民主文化本身的性质。个人的自由和尊严、政府要取得被治理者同意的原则，这些崇高的民主思想，都是既高尚而又鼓舞人心的概念。它们吸引了许多新兴国家的和进行现代化的古老国家的领导人的想象力。但是，民主政体和它的公民文化的现行原则——政治精英决策的方式，他们的规范和态度，普通公民的规范和态度，领袖和政府的关系以及他和他的选民的关系——则是更微妙的文化部分。它们在信念系统或人际关系规则方面具有更为分散的性质。人类学家告诉我们，这些信念系统和人际关系规则，都只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传播的，并在传播过程中产生实质性的变化。

事实上，西方社会科学刚开始整理民主政体本身运转的特点。合理的官僚机构的理论和实践，作为民主政权的一种工具，还不到100年。对于建立某种中立的官僚机构，英国在本世纪30年代就出现了怀疑，而在今天的欧洲大陆，这种怀疑已经相当普遍了。民主政体的复杂基础结构——政党、利益集团和传播媒

① 见弗雷德里克·C.巴洪：《苏联政治文化》(Frederick C. Barghoorn, "Soviet Political Culture")，这是一篇为1962年夏季政治文化讲习班准备的论文。此次讲习班由比较政治委员会、社会科学研究会赞助。——原注